

---

---

# 西汉海伐卫氏朝鲜考论\*

苗威 李新

---

---

〔摘要〕元封二年，汉武帝派遣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五万楼船军“从齐浮渤海”，同荀彘统领的陆军共同进攻卫氏朝鲜。从“外臣”到在其故地“置四郡”，西汉对大同江中心流域的治理发生质的变化。同时，水路军队过渤海参与灭亡朝鲜的战争，不仅体现汉武帝时期航运水平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汉代的楼船，充实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赴朝鲜战争的相关问题，为学界对汉代战争史、航海史、海洋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杨仆 西汉 卫氏朝鲜

**Abstract:** In 109 BC ( the second year of Yuanfeng) ,under the order of Emperor Wu of Han , a navy of 50 000 soldiers led by General Yang Pu sailed from Qi ( present-day Shandong Province) across the Bohai Sea towards Gojoseon to conquer Wiman Joseon , together with the forces led by General Xun Zhi. There was a great change of the Han Court's policy towards the Datong River Area ,from accepting Wiman Joseon as a foreign subject to establishing four Han command posts in the area. The Han naval forces' conquest of Wiman Joseon not only showcases the advanced maritime technologie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 i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ar , navigation as well as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 enabling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an Dynasty's storeyed warships ( 楼船) and General Yang Pu's conquest of Wiman Joseon.

**Keywords:** Yang Pu;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iman Joseon

DOI:10.16674/j.cnki.cn35-1066/u.2018.02.008

---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专项“中国与朝鲜、韩古史体系冲突研究”(17VGB005)阶段性成果。

元封年间，汉朝的国威正如严安所云“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sup>(1)</sup>以权宜之策暂时解决了困扰中原王朝的北部匈奴边患，同时南灭两越、西南夷之后，东北边疆的“外臣”卫氏朝鲜不仅无“臣”之实，而且违忤汉武帝的“谯谕”，因而西汉以武力经略朝鲜提上日程。

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卫满取得朝鲜王位，辽东太守与其订立“外臣”之约，并且规定了双方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卫氏朝鲜被纳入西汉“外臣”序列之中。但卫氏朝鲜悉数违背了“外臣”之职“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闕不通”<sup>(2)</sup>；还越界杀害汉朝边官。故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派水陆两路大军进攻朝鲜：陆路由左将军荀彘率领，从辽东进入；水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渡渤海进入朝鲜。而这其中水路“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sup>(3)</sup>，是秦汉时期渤海航海史以及汉代的海洋军事实力的重要体现。

关于杨仆浮渤海赴朝鲜作战的相关问题，仅王子今从航海史、海洋史的角度，结合史料与考古成果探究了杨仆所率楼船军的属性，考证了所乘楼船的功能，质疑楼船作为战船的传统说法而提出了是作为运输工具，同时亦考证了“从齐浮渤海”的出发地及目的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sup>(4)</sup>关于汉朝出兵朝鲜，苗威认为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卫氏朝鲜与辽东太守所订立的“外臣”之约已成一纸空文；二是汉武帝的“谯谕”使杀害朝鲜裨王；三是卫氏朝鲜袭杀汉官成为战争导火索。<sup>(5)</sup>金毓黻等也有论述。<sup>(6)</sup>除此之外，一些关于汉代的航海史、造船史及军事史的著作及论文对于这一历史事件都有所提及，但都是从造船史的角度探究汉代的船舶制造业，提及汉代楼船的样式及功能，一致认为楼船乃是汉代精湛造船技术的体现，同时对汉代的造船基地以及港口进行探究。而论文方面亦有对楼船

(1) (东汉)班固《汉书》卷64下，《严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813页。

(2)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5，《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86页。

(3)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7页。

(4) 王子今《论杨仆击朝鲜楼船军“从齐浮渤海”及相关问题》，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5) 苗威《古朝鲜研究》，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苗威《乐浪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6) 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台北：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

功能、形制进行专门探索。<sup>〔1〕</sup>但以上著作论文也仅是浅尝辄止，对于具体的相关问题并未涉及。

边疆史的研究中，尤为重要的领域即是海疆史。我国学界目前对于海洋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从时代的角度看，集中于唐宋以后，尤其是元明清时期；从地域上看则集中于东部、东南部、南部海域，对于渤海、黄海等东北海域尚缺乏关注。尽管学界对于汉代的楼船、造船基地等方面还是有所关注，但是对于西汉从海路攻打卫氏朝鲜的相关问题缺乏具体研究，尤其对于楼船功能的探究基本上是浅尝辄止。我们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力图通过对楼船的形制以及古籍的挖掘重组来考证楼船的真实功能，同时也对主将杨仆的个人性格进行分析，进而对汉武帝时期的海战能力进行探讨，从而了解西汉边疆经略中的海上因素。

## 一、西汉军队从海上赴朝鲜作战的背景及过程

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卫满称王，至汉武帝时代，卫氏朝鲜历经三代，无论是国力还是官僚机构，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完善。在卫满时期，卫氏朝鲜的官僚机构十分健全，“上下之职，文武之道，在卫氏朝鲜的国家机器中皆成系统。完善的国家机器为其对抗汉朝的统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sup>〔2〕</sup>。而汉朝至武帝时代，大一统思想明确，使结束不履臣职的外臣统治提上日程。

〔1〕 相关著作唐志拨《中国舰船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金秋鹏《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中国航海学会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章巽《中国航海科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包遵彭《中国海军史》，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年；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年；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相关论文主要有邓端本《古代的楼船》，载《航海》1983年第10期；刘凤鸣《汉武帝巡海与汉帝国“环黄海圈”的形成》，载《国家航海》2014年第1期；上官绪智、温乐平《从秦汉时期造船业看水军战船及后勤漕运保障》，载《南都学坛》2004年第2期；孙占民、程林《秦汉楼船考》，载《昆明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王赛时《古代山东与辽东的航海往来》，载《海交史研究》2005年第1期；王子今《“博昌习船者”考论》，载《齐鲁文化研究》2013年；王子今、乔松林《〈汉书〉的海洋纪事》，载《齐鲁文化研究》2012年第4期；王子今《秦汉时期的船舶制造业》，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1期；王子今《〈史记〉的海洋视角》，载《博览群书》2013年第12期；王子今《汉代的“海人”》，载《紫禁城》2004年第10期；王子今《秦汉海洋交通与中外文化交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第4期；杨鸿《水军和战船——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五》，载《文物》1979年第3期；张玉林《先秦秦汉水军战船概述》，载《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中国古代名船”汉代楼船》，载《西部交通科技》2015年第7期。

〔2〕 苗威《古朝鲜研究》，第231页。

### (一) 汉朝与卫氏朝鲜战争的背景

朝鲜存国期间，东亚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规范明确，古朝鲜在箕氏、卫氏治理期间，分别是两周、秦的‘侯国’，以及西汉的‘外臣’，皆是隶属于中原天子统治体系之内的政治势力。<sup>(1)</sup>

卫氏朝鲜建立之初，实力并不强大，直至与西汉缔结了“外臣”之约，情况才发生较大的变化，《史记》卷115《朝鲜列传》载：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sup>(2)</sup>

据此可知，辽东太守与卫满订立“外臣”之约时即已规定了双方的关系及职责，并对双方应履行的义务有明确的规定：一是“保塞外蛮夷”，即对燕辽东长城之外的少数民族有统治权；二是“无使盗边”，即保证周边少数民族不在边境骚扰，维持西汉边疆的安宁与稳定；三是“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即卫氏朝鲜不得干预周边的民族政权首领入朝见天子。“实际上，‘外臣’之约表明，西汉王朝已经将东北民族管辖权委托给卫氏朝鲜。卫氏朝鲜成为继南越之后，汉朝的第二个外臣。”<sup>(3)</sup>

自汉高祖时代至文景时期，西汉虽然成为继秦之后的一统王朝，但是秦末以来的战乱给西汉带来严重创伤，需用较大精力进行恢复。所以边疆政权各行其事，卫氏朝鲜趁此之机，发展壮大，并随之违背了“外臣”之约，不守外臣之职。据《史记》记载：

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闕不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沮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sup>(4)</sup>

《汉书》与《史记》记载基本无异，这段记载表明汉朝出兵朝鲜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卫氏朝鲜到右渠王时，已经公然违忤汉天子。具体表现为大量招徕汉人逃往半岛；不行“外臣”之礼；阻碍真番等国入见汉天子之路。可见，当时卫满与辽东太守所订立的“外臣”之约已成一纸空文。二是汉武帝的“谯谕”使杀害朝鲜裨王。鉴于卫氏朝鲜的不臣，汉武帝遂于元封二年（前109），派遣涉何为“谯谕使”前往朝鲜责备右渠，然而右渠“终不肯奉诏”，于是涉何在返回至边界时，于沮水边上，将送行的朝鲜裨王长杀死，后飞驰入塞。归来报告汉武帝说“杀朝鲜将”。汉武帝不仅对涉何这种行为不加批评，而且还“为其名美”，并“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汉武帝此举应该是有深意的，将与朝鲜有怨隙的官员派遣到和朝鲜比邻的辽东郡为都尉，实际上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若朝鲜有臣

(1) 苗威 《“古朝鲜”的伦理考察》，载《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

(2)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6页。

(3) 苗威 《乐浪研究》，第57页。

(4)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6-2987页。

子之心，自然相安无事；而若朝鲜伺机为裨王报仇，说明卫氏朝鲜已无臣意，这样也就为汉朝以武力经略古朝鲜之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三是卫氏朝鲜袭杀汉官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在涉何到辽东东部都尉任上后，卫氏朝鲜果然“发兵袭杀涉何”。这次朝鲜袭杀涉何，对于汉武帝来说是一个对朝鲜经略发生转变的重要事件。自此，汉朝改变了对卫氏朝鲜的怀柔政策，转而以武力征剿。

## （二）杨仆渡海作战的过程

汉朝与朝鲜当时以涓水（今清川江）为界，朝鲜东临大海，但汉的楼船军已是精锐部队，能渡海作战。因汉朝兵分两路进攻朝鲜，所以朝鲜除在涓水布防外，还坚守王险城，以抵御楼船军渡海攻击。《史记》记载：

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右渠发兵距险。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失其众，遁山中十余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涓水西军，未能破自前。<sup>〔1〕</sup>

元封二年（前109）夏四月，朝鲜王右渠袭杀辽东东部都尉涉何，汉武帝乃募天下罪人为兵，讨伐朝鲜。同年秋，部署陆海两路大军进击朝鲜：一是楼船将军杨仆将楼船军五万，自齐地出发横渡渤海直指王险城；二是左将军荀彘将陆兵出辽东，也以王险城为目标，进攻涓水南岸的朝鲜兵。至于汉武帝为何兵分两路进攻朝鲜，我们认为有三点原因：第一就是汉武帝时期造船业、航海技术发达，为杨仆率军渡海提供了硬件。尽管史书对渡海作战记载较少，但是，汉武帝时期，汉代的船舰已经具备渡海作战的能力。第二就是宣扬国势。强大的水陆两军，尤其是水军不仅体现了汉朝发达的造船、航海能力，更为关键的是彰显出汉朝对渤海海洋的控制能力。第三就是在击南越战争时，“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sup>〔2〕</sup>。所以，为避免右渠等人从海上逃走，汉武帝直接派遣水陆两路大军进击朝鲜。楼船将军杨仆所率领前军七千人，皆为齐兵，首先抵达列口，未待左将军到达会师，就疾趋王险城展开进攻。朝鲜王右渠从城上窥知汉兵多寡，见杨仆兵少，乃出城攻击，楼船军大败散走。杨仆乃退入山中十余日，收集散卒，准备待左将军到达，再兴攻势。

## 二、杨仆率军所乘“楼船”之功能

“汉代史书中记载的‘楼船’，大体包括两种意义，一种是兵制上的专称，它与材官、骑士等，同为正卒的一种；另一种则是指江海地区所用船舰的通称。”<sup>〔3〕</sup> 从上可知，汉代

〔1〕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7页。

〔2〕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6页。

〔3〕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年，第34-35页。

涉水作战一般是派遣楼船将军率领楼船军，为正卒的一种；而水军所乘的船舶也通称为楼船。

实际上，在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反，武帝即令“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sup>(1)</sup>。又据《史记·南越列传》裴骃集解引应劭所云“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也。”<sup>(2)</sup>在《汉书》载元封二年（前109）遣楼船将军击朝鲜时，注引应劭之说，文字亦同。尽管这是后世注家的一种说法，但仍可理解为汉代楼船军出征所乘船舶应为楼船。同时，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sup>(3)</sup>，直接写出了汉将马援击交趾九真时率领楼船两千余艘，而楼船亦有大小之分。故我们认为，杨仆所率领楼船军击朝鲜所乘的船舶应有楼船，另一佐证即《史记》卷30《平准书》中所载：

是时越欲与汉用战船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sup>(4)</sup>

“治楼船”且“高十余丈”很明显指出击南越之时武帝所遣南方的十万楼船士所乘的主力船舶即楼船，故击朝鲜战争所遣舰队亦应是以楼船为主所组成的。因此对于杨仆浮海赴朝鲜战争所乘楼船的功能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在《先秦秦汉水军战船概述》<sup>(5)</sup>中张玉林提出了楼船的功能：指挥、作战和运输。实际上，汉代的楼船作为战船参与战斗这一功能是有待商榷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汉代的楼船作为游船使用，并且在水战中具有以张形势的功能。

首先，从楼船的形制来看，汉代的楼船<sup>(6)</sup>是具有游船的功能。据上文《史记》裴骃集解引应劭所言“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也。”<sup>(7)</sup>可见，楼船就是船上建造多层建筑。《史记·平准书》记载“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sup>(8)</sup>《后汉书·隗嚣公孙述传》：“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sup>(9)</sup>对于楼船“高十余丈”“十层赤楼帛兰船”，不确定是否有过分夸大之词，但若记载为真，那么对汉代的楼船形制可有大致了解：高十余丈，船上施楼，十层，有的楼船以锦帛装饰。《说文解字》：“丈，十尺也。”汉代一尺大约21.25至23.75厘米左右，十丈则21至24米左右，大约相当于今八九层楼高，可谓相当高大，气势雄伟。而“十层赤楼帛船”就是以锦帛

(1)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4页。

(2)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5页。

(3) (南朝·宋)范曄《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839页。

(4)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6页。

(5) 张玉林《先秦秦汉水军战船概述》，载《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6) 《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武经总要前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89-490页。

(7)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5页。

(8)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6页。

(9) 《后汉书》卷13，《隗嚣公孙述列传》，第537页。

装饰栏槛，可以看出楼船装饰华美壮丽，此等楼船应是作为游船使用。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作《秋风辞》：“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汉武帝与群臣乘楼船游览于汾河之上，楼船是作为皇帝的游船使用的。

其次，楼船具有指挥战舰的功能。楼船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是一种重要船舰，被看做是相当于陆军的行楼车，据载：

阖闾见子胥，敢问船运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剡定骑也。<sup>(1)</sup>

又《广雅·释水》疏证“船上为楼谓之楼船，犹车上为楼谓之楼车”<sup>(2)</sup>，据此二者，可以得知楼船的功能与形制相当于陵军的行楼车。《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解扬）登诸楼车<sup>(3)</sup>。楼车<sup>(4)</sup>，古代战车的一种，上设望台，用以窥探敌人虚实，亦称“巢车”“轘车”。《说文解字·车部》载“轘，兵高车，加巢以望敌也。”在《左传·成公十六年》中，“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sup>(5)</sup>。所以，与楼车形制、功能相似的楼船，应该是船上施楼，以居高远望观察敌人，以此可以看出楼船应是具有指挥战舰的功能。

再次，传统认为楼船的另一功能就是作为战舰直接参与战斗，“楼船，取代余皇，是先秦秦汉时期经常使用的大型水军战船”<sup>(6)</sup>。《通典·兵典》载“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sup>(7)</sup>对于楼船结构及武器装备，在《太白阴经》亦有相似描述。所以一般认为，楼船具有综合性战船的功能，是水军的主力战船。但一般学者的引用有失偏驳，因为在《通典·兵典》与《太白阴经》中除了记载楼船结构与武器装备，更为关键提出了“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成形势”<sup>(8)</sup>。可见，船上施楼的楼船尽管状如堡垒，弩窗、矛穴、抛车、垒石、铁汁等武器一应俱全，但是却有着巨大缺陷——遇到暴风人力不能控制。这正是因为楼船船体高大稳定性差所导致。“就汉代文献分析，看来‘楼船’似乎并没有在实战中发挥战舰的作用。”<sup>(9)</sup>所以尽管形制、外观来看楼船是作为战舰，但楼船是否在实战参与战斗仍待考证。《史记·南越列传》记载：

(1)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770，《舟部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413页。

(2) (清)王念孙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5页。

(3)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7页。

(4) 《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武经总要前集》，第469页。

(5)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37页。

(6) 张玉林《先秦秦汉水军战船概述》，载《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7) (唐)杜佑《通典》卷160《兵典·水平及水战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22页。

(8) 《通典》卷160《兵典·水平及水战具》，第4122页。

(9) 王子今《论杨仆击朝鲜楼船军“从齐浮渤海”及相关问题》，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sup>〔1〕</sup>

“这是一次以舟船作为主要军运方式的战役，‘楼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2〕</sup> 汉击南越战争，据史书中记载多为陆上战争，而没有提及使用战船进行水战，所以楼船在两越战争之时应发挥的是运输的功能。

前文已经论述，在击南越战争和朝鲜战争时，汉武帝所遣的楼船军所乘船舶应是楼船，而此楼船为舰队所有船舶的通称，原因不再赘述。但杨仆楼船军所乘的船只应该不只有楼船，还有其他种类船只，其他船只应以运兵为主要功能。“楼船军的编成，船只可能也是大小相杂，并非一色‘大船’。”<sup>〔3〕</sup> “舰队中除了楼船以外，还配备有其他各种作战舰只。”<sup>〔4〕</sup> 秦朝以后楼船不断发展，成为水军主力之一，在汉朝以楼船作为主力的水师已经非常强大。“楼船通常是一般舰船，有时亦可是某一特定舰船的专称。”<sup>〔5〕</sup> 可见，楼船既是作为专称，也可作为舰队所有船的统称。杨仆率领楼船军“从齐浮渤海”的舰队中，应该不只有楼船一种船，还有其他种类船只，而楼船也有大小之分，大型楼船即前文所述“高十余丈”的船上施楼十层的大船，而本次浮渤海的舰队中大型楼船主要的功能应是发挥以张声势的功能，而非运输、战船和指挥功能。原因有二：

第一，楼船发挥指挥功能，前提是交战双方在水上作战。楼船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种重要的舟船，相当于陆军的行楼车，这是战争双方在水上较量时楼船所发挥的指挥作用。但《史记·朝鲜列传》载“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sup>〔6〕</sup> 说明楼船军与朝鲜军在城外战斗，主要以陆战为主，楼船并未发挥指挥舰作用。

第二，因楼船形制“高十余丈”，船上施十层楼，作为杨仆舰队的主力楼船，在外形上更应是气势恢宏，船体高大。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汉代楼船军出征，动辄“十万”“二十万”，而文献记载杨仆所率领楼船军仅“兵五万人”。《史记·南越列传》“(汉武帝)乃下赫曰：‘……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sup>〔7〕</sup>，而楼船军的人数有时达到二十万人，《史记·平准书》“南越反……赫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sup>〔8〕</sup>，而《史记·朝鲜列传》“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

〔1〕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5页。

〔2〕 王子今《论杨仆击朝鲜楼船军“从齐浮渤海”及相关问题》，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 王子今《论杨仆击朝鲜楼船军“从齐浮渤海”及相关问题》。

〔4〕 金秋鹏《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84页。

〔5〕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51页。

〔6〕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7页。

〔7〕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4页。

〔8〕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9页。

海;兵五万人。”<sup>(1)</sup> 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渡海,而非走传统的“傍海道”、内河及江湖,所以杨仆所率领的楼船军仅“兵五万”,而不同于平定两越时“十万”“二十万”楼船军。楼船船体高十余丈,稳定性较差,而“浮渤海”尽管是穿过内海,但是相较于攻南越、东越,楼船主要在内河、江湖或者傍海道而行,所承受的风力还是不同的。这也从反方向证明了这次远征的舰队不可能全是楼船,也应该有其他种类船舰。而“从齐浮渤海”的楼船不能作为运输工具也是因此。汉代尽管“傍海道”及内河、江湖航运十分发达,但是,船舶对于自然的抵抗能力十分有限,而楼船因其船体高大,自然稳定性较差。《汉书·隗疏于薛平彭传》载薛广德谏止汉元帝御楼船济渭时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sup>(2)</sup>;《三国志·吴书·董袭传》载,东汉末年,孙权使偏将军董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sup>(3)</sup>;而《太白阴经》载“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不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张形势”<sup>(4)</sup>。《武经总要》记载亦相似。可见,楼船虽是水军的重要船舰,但是,如果遇到风暴无法靠人力控制,使用起来不大方便。所以,在战争中楼船更有可能是发挥以张声势的作用,而非其他。尽管“秦汉时期,可以最集中地体现造船技术水平的船型是楼船”<sup>(5)</sup>,但是因其形制高大,稳定性较差,所以不能发挥渡海运输作用。正如黄今言所言“至于水兵渡海作战的情况更少”<sup>(6)</sup>。所以,杨仆楼船军渡海作战对于汉代军事史有着重要意义。

### 三、杨仆浮海击朝鲜的影响和意义

楼船将军杨仆为人敢挚行,放纵欲望,急于立功,有大将之勇却缺大将之谋。尤其在经历了击南越时勇挫越锋,即将功名成就之时,越人却投降于伏波将军,所以,在攻朝鲜时杨仆应是吸取教训,转变了以往之攻势,采取招降卫氏朝鲜之策。

根据《史记》卷113《南越列传》载:

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峡,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sup>(7)</sup>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汉武帝遣“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sup>(8)</sup>。次年,楼船将军杨仆所率领精锐部队势如破竹,挫败越人锋勇,等待与伏波将军会师,共

(1)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7页。

(2) (东汉)班固《汉书》卷71,《隗疏于薛平彭传》,第2813页。

(3) (晋)陈寿《三国志》卷55,《吴书·董袭传》,第1291页。

(4) (唐)李荃著,孙继民译《太白阴经》卷4,《水战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3页。

(5)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船舶制造业》,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1期。

(6) 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213页。

(7)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5-2976页。

(8)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4页。

同进攻番禺。楼船将军与伏波将军会师之时，楼船所率兵“数万人”，而伏波仅有“千余人”。在进攻越人城时，楼船将军勇猛逼人，大败越人，并纵火烧城，而伏波将军虽未力攻克敌，但其闻名于越人，伏波遣使者招降越人，最终“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sup>(1)</sup>。楼船将军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但其“从欲，怠傲失惑”<sup>(2)</sup>，不如伏波将军“智虑愈殖”<sup>(3)</sup>，而“譬若纠墨”，成败瞬间转换，终将胜利果实转手他人。从击东越战争杨仆不顾“士卒劳倦”“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sup>(4)</sup>，可以看出杨仆是急于立功进爵之人。但击南越“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肯定会对杨仆在击朝鲜战争中的决策产生影响。故在击朝鲜左将军欲与楼船如期会战一起进攻王险之时，杨仆更多的采取“楼船欲急就其约，不会”<sup>(5)</sup>。“欲急”二字极能体现杨仆立功心切，急于与朝鲜方面订立和约，以独享战功。正如司马迁所言“楼船将狭，及难离咎。悔失番禺，乃反见疑。”<sup>(6)</sup>

元封二年（前109），楼船将军所率领的水路部队先于左将军荀彘的陆军抵达列口，未待左将军荀彘会师，便“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却寡不敌众，被右渠击败，“军败散走”，后退入山中十余日收集散卒，等待左将军到达，再兴攻势。左将军到达之后，杨仆与荀彘对待卫氏朝鲜主张发生分歧，荀彘主张攻破王险城而灭之，杨仆则主张约降。又因水陆两军互不相属，杨仆、荀彘二人各怀异志，中了卫氏朝鲜的离间之计，导致迟迟没有攻破王险。杨仆“其围右渠，常持和节”<sup>(7)</sup>，不仅是因为“楼船将齐卒，入海，固已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因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sup>(8)</sup>。同时，击南越“悔失番禺”也对其决策造成影响，在面对“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的左将军，杨仆主张招降右渠，而这一决策也对击朝鲜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王险城迟迟未攻破下来。

即使杨仆个人性格及决策对战争有所影响，但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楼船军五万人“从齐浮渤海”是汉代历史上不可否认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在楼船军征朝鲜成功后，汉武帝“故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sup>(9)</sup>，更为关键的是，“楼船军远征朝鲜为东方航海史的一大创举”<sup>(10)</sup>。楼船军“从齐浮渤海”是我国古代航海史的重要一环，是汉代航海能力与海洋军事实力的重要体现，对其研究可以填补我国东北海域航海史、海洋史的空白。

(1)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6页。

(2)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8页。

(3)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8页。

(4)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82页。

(5)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8页。

(6)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90页。

(7)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8页。

(8)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8页。

(9) 《汉书》卷95，《朝鲜传》，第3867页。

(10) 王子今、乔松林《〈汉书〉的海洋纪事》，载《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

实际上，汉代的航海十分发达，海洋军事实力强大，造船技术高超。汉代的楼船，高十余丈，气势宏伟，船体高大，主要有运输、战舰、游船等功能。尽管会受到风暴的影响，不便控制，但是，作为水军战船，发挥着以张声势的功能。通过对楼船将军杨仆所率舰队的细致分析，可知这次远征的舰队不是只有楼船这一种船型，同时也会有其他战船。而以楼船命名楼船军，则是因为“秦汉时期，最可以集中地体现造船技术水平的船型是楼船”<sup>〔1〕</sup>。

而汉代发达的航海业使得沿江海地区都设有港口及楼船基地，并且以水家子弟作为楼船军进行培养。汉代的水军建制是较为完备的。汉代楼船军主要是郡国之兵，所以杨仆所率领的楼船军主要是以齐兵为主，是五万楼船军的精锐部队。但因楼船军主要是齐地的渔民和水家子弟充当，尽管受到了正规军事训练，但是毕竟为水兵，在以陆战为主的击朝鲜战争中优势不大。所以寡不敌众，刚至王险就被右渠打败。同时，汉代沿渤海沿岸已经形成了重要的港口。既然杨仆所率领主要为齐兵，杨仆“从齐浮渤海”的出发地也应是齐地重要的港口以及造船基地，而黄腫港既可以作为后方补给基地同时亦是汉代重要的港口，为楼船军出发地可能性较大。

综上所述，汉武帝发水陆两路大军，投入数万兵力，历时两年灭亡朝鲜，在其故地建立乐浪等四郡对大同江中心流域进行直接统治。这一方面完成对匈奴的制衡，另一方面也在建构完整的边疆经略体系，同时以实践检验了这一体系的有效性。在对卫氏朝鲜武统的过程中，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水军从山东的港口出发，至列口（大同江口）登陆，包围并攻击朝鲜的核心区域，对于此次战争影响深远。更为重要的是，杨仆率五万楼船军渡海远征朝鲜是汉代航海史上的重大创举，体现了汉代水军基地、水军建制的完备以及汉代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的高超，而其率军所乘之楼船更为汉代造船技术的体现。囿于史料不足，我们对于水军所乘船只的种类以及汉代齐地的造船基地缺乏深入探讨的资料，有待日后进一步发现补充。

作者苗威：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1〕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船舶制造业》，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1期。